

陈祖美 主编  
陶文鹏 编著

任

平

生

一

蓑

烟

雨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苏轼  
1037—1101

陈祖美 主编  
陶文鹏 编著

一蓑烟雨任平生

# 苏轼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集/陶文鹏编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7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ISBN 978-7-5559-0196-9

I.①一… II.①陶… III.①宋词-选集 IV.①  
I22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668号

---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mailto: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88 00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苏轼(1036—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召直史馆，出杭州通判。神宗元丰二年(1079)知湖州时，被指控讥刺新法而下狱，后贬黄州团练副使。元祐中，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后又改知颖州、扬州。还，迁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再知定州。绍圣初，又被劾奏讥斥先朝，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赦还。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后追谥文忠。

苏轼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是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罕有的通才。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雄旷放，善用夸张比喻，富于理趣，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工书画，为宋代四大书家之一。著述颇富，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

## 总 序

◎陈祖美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白居易描绘春日柳条迎风摇曳之态的名句，无形中似乎也道出了唐宋诗词千姿百态的风姿。从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后期到第二个千年的末期，在这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唐宋诗词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乳汁，她哺育和熏陶过多少人，她的魅力又使多少人为之倾倒，恐怕谁也无法数计。

然而，有一个事实却为人熟知，这就是在唐宋诗词作家中，特别是其中的名家如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温庭筠、李煜、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且不说在他们生前身后所担荷的痛苦或所受到的物议和攻讦“罄竹难书”，更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在21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这得追溯到1998年的国庆佳节前夕。那是一个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金秋时节，四五十位专家学者从四面八方来到河南——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家乡，出席李商隐学术研究会第四届年会。由于东道主把此事作为一种文化建设对待，更由于成果斐然的诸位李商隐研究专家的莅临，此次年会的成功和人们的热诚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本套丛书最初的编撰契机，却是出人意料的：由于对李商隐的全盘否定和极力攻伐所引发的一种抵触——那仿佛是一位挺面善的老人，他历数李商隐种种“罪愆”的具体词句一时想不起了，大意则说李商隐是“教唆犯”。他不但自己坚决不读李商隐，也严令其子女远离这个“教唆犯”，因此他的孩子都很有出息。听了这番话，有位大学女教师娓娓道出了她心目中的李商隐，而她的话代表了在座多数人的心声。不必再对那位老人反唇相讥，听了这位女教师的一席话，是非曲直更加泾渭分明。尽管这样，上述那种离奇的话，还是值

得深思和认真对待的。

刚迈出这个会场的门槛，时任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的王国钦先生叫住了我，以商量的口气询问：能否尽快搞一本深入浅出而又雅俗共赏的李商隐诗歌类编，以消除由于其作品内容幽深和文字障碍等所造成的对其不应有的误解，甚至曲解……联想到上述那位老人莫名其妙的激愤情绪，王国钦先生的这一建议，显然既是出自编辑出版人员的职业敏感，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社会责任心。人非木石，对这种公益之举岂有无动于衷之理！后来听说，王国钦还想约请那位堪称李商隐知音的女教师撰写一本《走近李商隐》。这更说明作为编辑出版者的良苦用心，并进而激发了作者的积极性和应有的责任感。

当我回京后复函明确告知愿意参与此事时，随之得到了王国钦大致这样的回音：一两本书难成气候，出版社领导采纳了王国钦以及发行科同人的倡议，计划力争搞成一套丛书，并将之命名为“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而且，还随信寄来了较为详细的丛书策划方案。方案显示：丛书除包括唐代的大李杜、小李杜和宋代的柳、苏、李、辛八卷作品集以外，唐、宋各选一本其他著名诗家词人的精品合集。整套丛书一共十本，每本约三十万字。我当即表示很赞赏这一策划，除建议将李清照换成陆游外，无其他异议。而换掉李清照，并不是因为她的作品达不到精品的档次（相反她的各类作品中精品比例比谁都大），只是因为她在中、晚年遭逢乱世，流寓中大部分著作佚失得无影无踪。后人陆续辑得的十多首诗和比较可靠的约五十首词，即使都算作精品，也很难编撰成一本约三十万字的书稿。当然，要是将评析部分写成两三千言的长文，字数达标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样做，一则太长的文字不尽符合丛书“点评”的体例，二则主要是担心不合乎当今和未来读者的口味与需求。而号称“六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人呼“小太白”，其作品总和万数有余，古今无双，选择的余地非常大，容易保质保量。

双方很快达成了共识。在这里，我愿意负责地告诉读者：“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丛书，以创新新颖、方便读者为宗旨。所谓创新新颖，是指本丛书既不排除“别裁”式的分类方法，更知难而进地在全面吃透作品内容的基础上，从“题材”方面分门别类。类似的分类，以往只在有关唐人绝句等方面的多人选集中见到过，像这样既兼顾体裁又着眼于题材的分类，尚属前所未有的。本丛书还在每类相同题材的若干作品中，均以画龙点睛的诗句作为小标题，每本书则以该作家作品中的最为警策之句加以命名，于是就有了《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集》《每

依北斗望京华·杜甫集》等一连串或气势不凡或动人情愫的书名。从每集作者作品中选取一句最恰如其分的诗句,用作该集的书名——这一创意本身,无形中体现了出版社对“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丛书的一种极为独到而又相当可取的策划思路。对整套丛书来说,则力求做到“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就是说,同类精品都有哪些可以一目了然。由此所派生的本丛书其他方面的特点和适用之处,则在每一本书中都不难发现。

原先没有想到的是,出版社囑我担任整套丛书的主编并撰写总序。对此,我曾经再三谢辞。直到最后同意忝于此事,其间经历了一个不算短的过程,延缓了编撰时间,使出版社在策划之际尚得风气之先的这套丛书,耽搁了一段时间优势。为了顾及一定的时间效益,我于酷暑炎夏中攻苦食淡,最终亦可谓尽力而为了!

最重要的是选择和约请每一集作品的撰稿人。

丛书的第一本是大李(白),其编撰者林东海先生,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沿着李白的足迹进行过考察。这对深入研究李白、了解其诗歌的写作背景及题旨等,洵为得天独厚之优势。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诗人李白》(日文版)及近期关于李白的著,无不体现出林东海对这位“谪仙人”研究的深湛造诣。因而编撰“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丛书中的李白集,对林东海来说是轻车熟路、手到擒来之事;而对读者来说,则将有幸读到一本质量上乘的好书!

至于小李(商隐)诗歌编撰者黄世中先生,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于天涯海角与其谋面之前,已有多年的文笔之交,而且主要是谈及李商隐。仅我拜读过的黄世中有关玉溪生的论著已臻两位数。他对人们所感兴趣的李商隐无题诗尤其研究有素,对李商隐著作的每种版本乃至每一首诗几乎无不耳熟能详,其家传和经眼的有关李义山的典籍,几乎难有与之相埒者。因此由黄世中承担本丛书的李商隐集,可谓厚积薄发,定能如大家所预期的那样,以深入浅出之作,引导人们沿着正确的途径走近李商隐,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说明其独特的价值之所在,从而向广大读者奉献一餐美味而富含营养的精神食粮。

人们所称“小李杜”中的小杜,指的是《樊川文集》的作者杜牧。关于杜牧诗歌的精品类编,之所以约请胡可先先生编撰,是因为早在他到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之前的1993年,就已有专著《杜牧研究丛稿》出版,可谓对杜牧研究有素。同时,笔者自然也联想到曾经拜读过的胡可先的一系列功力颇深的论文。如他



提供给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的关于“甘露之变”与晚唐文学的论文,其中既有惊心动魄之笔,亦有细致入微之文。特别是其中把“甘露之变”对文人心态的影响,以及晚唐诗歌之被目为“衰世之音”的原因所在,剖析得很有说服力。“甘露之变”时,杜牧刚过而立之年。稔悉这一政治和文学背景的胡可先,对杜牧诗歌进行注释和评点自然易近腴理,能于深邃之中探得其诗歌之内涵,弘扬其精华,同时也就消除了人们对杜牧的某种片面理解。

丛书的宋代名家中,柳永的年辈最高,但对其生平事迹和作品系年,后人都曾有重大误解。而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吴熊和先生,对此曾做过令人深信不疑的考证和厘定。柳永集的编撰者陶然先生,自然会承祧其业师的这些重大的学术成果,贯穿于自己的编著之中,从而撰成一本甄误出新之作。再者,陶然虽说是这套丛书十位编著者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他有着相当机智精练的语言功底。无论何种著作,行文中总是既以流丽多姿的现代语汇为主,又不时可见精粹的文言成分,其用语既富表现力,又令人颇感雅洁可读。同时,他作为年轻的文学博士,在其撰著中很善于运用新颖的科学论析方法,兼具宏观把握和微观剖析两方面的优长。表现在此著中,既有对词学源流的总体把握,又能对柳永诗词做出中肯可信的注释和评析。

苏轼是古往今来文学家中最具魅力的人物。选评苏轼诗词精品的陶文鹏先生,则是名声在外的多才多艺之辈。在他相继撰写、出版的多种论著中,有不少是关于苏轼诗词方面的,堪称是东坡难得的知音之一。以其不久前结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山水诗史》一书为例,关于苏轼的章节就写得特别全面深透。其中不仅有定性分析,还有相当精确的定量分析。在其他各种论著中,陶文鹏不仅对两千六百余首苏轼诗中的精品有所论列,对三百余首东坡词的代表作亦时有画龙点睛之评。在这样的基础上所撰成的本丛书苏轼集,更不时可见出新之笔。比如,书中引述“苏轼诗词创作同步说”,以及对《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故国神游”等句的新解,都体现了苏轼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从编著者的组成来看,这套丛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较多女性编著者的参与。人数虽然只有宋红、高利华、邓红梅、陈祖美四位,男女编著者的比例只是三比二,与“半边天”的比例还有些距离。但是请君试想:迄今为止,在有关古典文学作品的类似规模的丛书中,有哪一套书的女编著者或作者能占到这样大的比重?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编撰本丛书的初衷和着眼点,绝不是单纯地追求女作者的人头优势,主要还是在抱任何性别偏见的前提下,使每位撰著者的才华和实力得以平等展现!

不妨先从宋红先生说起。她从北大中文系毕业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不多久,就主持编辑了一本《〈诗经〉鉴赏集》。我在撰写其中《〈邶风·谷风〉细绎》一文的过程中,宋红在关于泾渭孰清孰浊的问题上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后来这篇标题为《借葑菲之采,诉弃妇之怨》的拙文,竟得到一些读者的由衷鼓励,这与宋红的建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她的才华在相当大的学术范围内几乎是有口皆碑的,这自然也与她所处的学术环境有关。以20世纪80年代初在出版界出现的“鉴赏热”为例,她所在的古典文学编辑室及时推出了规模可观、社会效益甚好的《中国古典文学鉴赏丛刊》。特别是较早出版的关于唐宋词、汉魏六朝诗歌和《诗经》等鉴赏集,对这一持续了约二十年之久的“鉴赏热”,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这期间,宋红在编、撰结合中得到了很实际的锻炼。所以,此次她在编撰本丛书杜甫集这一难度颇大的书稿时,一直是胸有成竹,甚至发现和纠正了研治杜诗的权威仇兆鳌等人的不少疏误。这种学术勇气和责任心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生在绍兴、长在绍兴的高利华先生,她喝的不仅是当年陆游喝过的镜湖水,而且与这位“亘古男儿一放翁”还有一种特殊的缘分——在她从杭大毕业回到绍兴任教不久,即参与筹办纪念陆游八百六十周年诞辰大型学术活动。这是她逐步走近陆游的一个难得的良好开端。此后每五年举办一次的同类学术活动,自然都少不了她这位陆游研究者的热心参与。直到今天,在她担负着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极为繁重的教学任务和该校学报执行主编的同时,她的身影还不时出现在陆游的三山故里及沈氏名园之中,进行实地考察、拍照,仿佛仍在时时谛听着陆游的创作心声……这一切,对于高利华正确地解读陆游均有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她所选评的本丛书陆游集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灯暗无人说断肠”一类中,她是把《钗头凤》作为陆游与其前妻唐琬彼此唱和的爱情悲剧之章收入的。这一点是有争议的。假如她一味按照自己的观点解读此词,无疑是片面的。好在高利华把这首词的有关“本事”及关于女主人翁是唐琬还是蜀妓的历代不同见解,在简短的文字中胪述得清清爽爽,洵可作为有关《钗头凤》词的一篇作品接受史和学术研究史来读。仅就这一点,没有对陆游研究的

相应功力和对这位爱国诗人的一颗赤诚之心,是难以做到的。

人们如果很欣赏哪位演员的表演才华,往往夸赞说某某浑身都是戏。我初次与邓红梅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谋面时,就明显地感觉到她浑身都透着活力。等到听了她的发言、看了她关于辛弃疾的文章之后,便感到这种活力远不止表现在触目所见的外形上,更洋溢于其智能、业绩之中。所以在考虑辛弃疾集的编著者时,我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位从江南来到辛弃疾故乡的、极富活力的女博士。当笔者与邓红梅在电话里初谈此事时,她二话没说,仿佛是不假思索地说:“我将写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辛弃疾!”果然不负所望,她很快将辛弃疾六百余首词中的佳作按题材分为主战爱国词和政治感慨词等十一类,从而把人称“词中之龙”的辛弃疾,由人及词全面深刻地做了一番透视与解剖。这样,即使原先是“稼轩词”的陌路人,读了邓红梅的这一编著,沿着她所开辟的这十多条路径往前走,肯定会离辛弃疾其人其词越来越近,并从中获得自己所渴望的高品位的精神享受。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应了那句“文章憎命达”的谶语,红梅竟在其春秋尚富的2012年离开了我们,我和不少熟悉她的文友都为之痛楚不堪!在她逝世两周年之际,“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丛书(共十卷)得以重新修订出版。此系每位编撰者有所期待的良机,然而九泉之下的红梅对于她所编撰的辛弃疾集则无缘加以厘定。忝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我有义务联手责编王国钦先生代替红梅料理她的这一学术后事。所以我在肠癌手术尚未痊愈的情况下,通校了辛弃疾集,从而深感红梅堪称辛稼轩的异代知音!她对每一首辛词的“点评”之深湛精到,令我不胜服膺。对于红梅出色“点评”的内容要旨,我未加任何改动。对于我在此次通校中所发现的问题,大致分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个别漏校或笔误,诸如“蛾眉”误作“娥眉”,“吟赏”误作“饮赏”,“疏”误为“书”,“金国”误为“全国”,“谕”误为“喻”,“询”误作“讯”等,径作改正。二是对于“惟”与“唯”,想必红梅曾和我一样理解为此二字必须严格区分,就连“唯一”也必须写作“惟一”;“唯”只用于“唯心”“唯物”等少数哲学词汇,其他均写作“惟”。然而在红梅去世后问世的《通用规范汉字字典》(商务印书馆,2013版)“惟”的第二义项与“唯”是相同的。所以我此次通通过的唐代合集和辛弃疾集中所用合乎《通用规范汉字字典》规定的“惟”字义项,都没有改动。

上述未经本人审阅的作者“小传”,鉴于笔者了解情况不尽全面,表述又不

见得很准确，所以不一定完全得到“传主们”的首肯。但是有一点，即使他们不予认可笔者也要坚持：这就是他们均为治学严谨的饱学或好学之士，对于唐宋诗词的研究尤为擅长。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所撰书稿很容易误人子弟。因为不论是唐诗宋词或唐词宋诗，其老版本都曾存有各种谬误。即使一些很有影响、极受欢迎的选本，当初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也都存在着种种不足之处。没有相应的学识，没有严谨的态度，不加深究，就很难发现问题，很容易以讹传讹。

本丛书的所有编撰者，在这方面都是可以信赖的。而他们的另一共同点是，大都具有与古代诗词名家发生共鸣的文学创作才能。仅就笔者经眼之作来说，比如林东海的《登戏马台》诗云：

当年戏马上高台，犹忆乌骓舞步开。  
九里狂沙怜赤剑，八千热血恨黄埃。  
时来竖子功名立，运去英雄霸业摧。  
回首楚宫空胜迹，云龙山外鹤鸣哀。

此系诗人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凭吊项羽之作，其用事、用典何等妙合自然，感慨又何等遥深，早被旧体诗词的行家里手赞为“诗风沉郁，颇似杜少陵之抑扬顿挫”。笔者所拜读过的林东海的其他诗作还有七绝《过邯郸学步桥》、七律《吊白少傅坟》《马嵬坡怀古》等，也都是思覃律精，足见功力之深。

在黄世中只有十五六岁时，他就曾有感于一出南戏对陆游、唐琬爱情悲剧表现之不足，遂写了一个自己心目中的陆唐情深的南音剧本，且作词、谱曲一气呵成，后来又把陆唐之恋编成了电影文学剧本。当他将这一剧本寄到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后，不久就收到该厂回复的长信，希望他对剧本做一些加工修改以期拍摄。同时，黄世中还把剧本寄奉郭老（沫若）和朱东润先生求教，并很快收到了郭老和朱先生加以鼓励的亲笔回信。笔者不仅细读过黄世中所写的历史小说和颇具规模的散文集，还亲耳聆听过其具有南昆韵味的自弹、自唱、自度之曲，其文艺才能可见一斑。

陶文鹏是新诗、旧诗俱爱，而且几乎是张口就来，出口成章。例如他的一首七律《晚云》：

岁月催人近六旬，经霜瘦竹尚精神。  
胸中故土青山秀，梦里童年琐事真。  
伏枥犹思腾万里，挥毫最喜绘三春。  
何须采菊东篱下，乐在凭栏对晚云。

此外，陶文鹏还有一副高亢嘹亮的歌喉，每次在学术会议上总是属于最为活跃的一族。多年来，他一肩双挑，编撰兼及，硕果累累。当然，这一次他将再度奉送给读者一个惊喜。

宋红谙悉音律，对旧体诗词的写作堪称得心应手。其长篇五古《咪咪歌》，把她的宠物猫咪写得活灵活现，想必谁读了都得为之捧腹不迭。此诗被识者誉为：“神机流动，天真自露。猫犹人也，可恼亦复可爱，以其野性存焉。”

在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那辈人中，旧体诗词的爱好者已不多见，擅长者更是凤毛麟角，而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的王国钦却对此情有独钟。20世纪90年代初，他曾写过一首题为《桂林赴上海机上偶得》的七律，诗云：

关山万里路何遥？鹏鸟腾飞上九霄。  
云海涛惊心海广，航空技越悟空高。  
却思尘世多喧扰，莫道洪荒不寂寥。  
笑瞰人间藏碧水，乾坤一点画中瞧。

此诗为老一代著名诗人所看重并为之精心评点：“……首联设问，引出壮志凌云；颌联设比，胸怀何其广大；颈联表现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尾联化大为小，小中见大，表现了作者对人间的无限依恋与热爱。作者融天上人间、喜乐忧烦、神话科技于一诗，别具情趣，也别有一种超乎时空的磅礴之气。”王国钦在诗词兼擅的基础上，还从1987年至今摸索、创造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度词、新词，并得到当代诗词界人士的广泛称赏。当初他来京商谈丛书编选的诸项事宜时，我因为手上稿事过多等缘故，希望与他一同主编丛书。他诚恳地说：自己可以多承担一些具体的编辑工作，主编还是由社外专家担任，所以只承担了宋代合集的任务。之所以再三邀他负责宋代合集的编选，也正是由于他对宋词的偏爱和对词体发展的不懈努力。

20世纪90年代初,中州古籍出版社曾出版、再版过一本享誉海内外的《当代诗词点评》。在这本厚达六百七十多页的选集中,所有编著者均按长幼顺序排列。排头是何香凝,而高利华是其中最年轻的女编著者——在当时也是旧体诗词界最为年轻的新生代。此书选收了高利华的《浣溪沙·夜出遇雨》《菩萨蛮·雨过索溪向晚戏水》等篇,行家认为其词善于将“陈句融化,别出新意,既富造詣,又见慧心”。其《八声甘州·八月十八观钱江潮》有句云:“叹放翁、秋风铁马,误几回、报国占鳌头。休瞧我,凭栏杆处,欲看吴钩。”此作更被知音者推为:“上片写景,是何等气势!下片怀古,是何等襟期!山阴多奇女子,信哉!”

笔者之所以对丛书编著者们如此着意介绍,既不同于孟子所云“知人论世”,也与胡仔所谓“知人料事”不尽相同。这里似乎略同于学术领域的“资格论证”和文化消费中的“品牌意识”,或者说借重上述诸位的专长和才华,以增加读者对这套丛书的信任感,在假货无孔不入的情势下使精神消费者能够放心。虽说人们对某种“品牌”的喜爱和信任程度,最终要靠“品牌”本身的质量说话;虽然即使声势浩大的“广告”,最终也不见能抵得过下自成蹊的“桃李”的魅力,但是还有一种“话不说不明,木不钻不透”的更为通俗和适用的道理——被埋在地下的夜明珠人们尚且看不到它的光芒,而一个新问世的“品牌”,多少也需要自我“表白”一番的。

本套丛书初版于2002年8月,之后已陆续重印多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丛书在封面设计、版式设计及印刷质量等方面略显不尽人意之外,但在内容的编选和点评方面却依然值得肯定。因此,丛书的本次重印,除由编选者对内容进行了个别的修订、勘误之外,还由出版社对封面、版式进行了重新设计,将印刷质量进一步提高。同时,本着“把辛苦留给自己,把方便提供给读者”的编辑初衷,丛书又在一些体例方面做了进一步规范。比如对于词牌、词题在目录或引述时的表述方式,无论是在学术界或是在出版界,并无明确而统一的规范形式,所以不同的编选者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的表述。而这对于一套丛书来说,就出现了体例上不统一的问题。经过多方的交流、咨询和讨论,出版社在修订时提出了统一规范的建议,笔者认为十分必要。

具体来说,规范之前的一般表述形式大约分为三种情况:(一)原作既有词牌又有词题:“词牌·词题”,如周邦彦《少年游·感旧》;(二)原作只有词牌却无词题:“词牌”,如秦观《鹊桥仙》;(三)原作只有词牌却无词题:“词牌(本词首

句)”,如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

本次规范之后,实际上是把第二、第三种无词题的情况合并为了一种形式,也就是说把原作无词题的情况统一都表述为“词牌(本词首句)”,如姜夔《暗香》(旧时月色)。进行这样的规范,起码有这样两点好处:(一)对现在并不太了解古典诗词(尤其是词)表现格式的读者来说,能够将有无词题的作品进行一目了然的区分;(二)对于一般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方便对同一作者同一词牌的多首作品进行准确表述及辨识。而出版社的这些建议和规范,恰恰是丛书初衷的自觉践行。作为本套丛书的主编,笔者当然表示尊重和欢迎。

一言以蔽之,这套丛书的最大特点和长处是策划独到、思路新颖,它仿佛为每位编选者提供了一双崭新的“鞋子”。穿上这双“新鞋”,是去“走世界”还是到唐宋诗词名人家里“串门子”,抑或是像“脚著谢公屐”似的爬山登高,那就该是因编选者各自不同的“心气”而有所不同的事情了。但我可以夸口的是:他们全都没有“穿新鞋走老路”!

初稿于1999年10月,北京

改定于1999年12月,郑州—北京

厘定于2015年元月,北京

## 前 言

北宋杰出的文学大家、一代文坛盟主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出生于四川眉山县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是个大器晚成的散文家，由发愤读书而入仕。母亲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很有文化教养，深明大义，曾对苏轼“亲授以书”，并以历史上的正直名臣激励他进取。弟弟苏辙，字子由，是苏轼一生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同道。苏轼成长于富有文化气氛的环境中，从小就受到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也接受了正统儒家经世济时的政治理想的教育。他勤奋好学，刚进成年，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轼与父亲一起到京城，次年与弟弟苏辙一同进士及第。嘉祐六年，又应制科考试，列为三等。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官至太常博士。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也是主张政治改革的。他曾经撰写过一系列策论，针对北宋王朝财乏、兵弱、官冗、赋制不均、边防空虚等问题，提出了改革主张。他认为应当抑制豪强地主的兼并，这与王安石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他强调“择吏任人”，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而这些观点却同王安石的新法针锋相对。他反对新法，在朝廷很难立足，便请求外任，通判杭州，后来又知徐州、密州、湖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一伙混入变法派的奸人罗织罪名，诬陷他以诗文讪谤朝廷，使他被捕入狱，酿成了著名的“乌台诗案”。由于宋神宗爱惜苏轼的才华，元老重臣上书营救，王安石也反对圣世杀才士，苏轼幸得释放并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任用旧党领袖司马光为宰相，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因属于旧党而被召回朝廷，连续升官，做到翰林学士和中书



舍人。他在多年的地方官任上，了解到王安石新法对国家和人民有许多好处，不同意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结果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夹攻，于是又被放外任，历知定州、杭州、扬州。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再次遭到迫害，先被贬惠州，继而被贬到天涯海角的琼州（今海南岛）。直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苏轼才遇赦。次年，苏轼病逝于北归途中。苏轼一生，时时处处都以国计民生为己任，屡遭诬陷迫害却始终不渝，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的崇高人格，将永远赢得中国人民的敬仰和热爱。

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本，但受道家和佛家的影响也很深。他少年时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十分赞赏杜甫“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王定国诗集叙》）的精神，钦慕屈原、诸葛亮、陆贽等经世济时的人物，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想做一个风节凜然、敢作敢为的儒者，实现辅君治国、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但他又博览佛道两家典籍，同许多和尚道人交往。他酷爱陶潜，追求老庄的隐逸生活，并热衷于道教养生之术。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主要方面是矛盾的，苏轼却将它们融会贯通。他善于从日常的人情事理着眼来把握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通相近之点，又善于依照致用的原则融合三家思想，借以圆通地观照事理和明达地处世应物。例如，他一生遵循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却扬弃了孔子等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迂执作风，也不赞成儒生高谈性命之学的空疏行径；他吸取了庄子追求自由超脱的精神和独立不倚的人格，而批评其否定社会厌弃人生的悲观论调；他学习佛家“静而达”的观物方法和达观的处世态度，却不沉溺于其玄奥难测的佛学教义之中。他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当他入仕从政时，特别是在地方官任上，主要信奉和推行儒家的政治思想；而当他被贬谪在野时，佛老的人生哲学又成为他的主要思想倾向。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苏轼交替使用这三种思想武器。总的来说，苏轼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质是以儒为体，以佛老为用。这使得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而又简易圆通。古代许多怀抱理想却在现实中碰壁的士大夫文人，诸如陶渊明、李白、白居易，包括与苏轼同时的王安石，只能做到儒家所主张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苏轼却能做到穷达如一。他居朝市时则为民请命，处山林仍心怀魏阙。无论穷还是达，都能既行兼济，又行独善。这是因为苏轼能以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看待穷和达，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不论“兼